

超常 增长

SUPERNORMAL
GROWTH

——
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

曹尔阶 著

解析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过程，引领未来经济导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超常 增长

SUPERNORMAL
GROWTH

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

曹尔阶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 / 曹尔阶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 - 7 - 305 - 19273 - 9

I. ①超… II. ①曹…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
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9923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

著 者 曹尔阶

责任编辑 方巧真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 - 83685720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72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9273 - 9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2012年出版了《资本是个好东西》，是尝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20世纪90年代大约四十多年讳言资本之后重塑资本形成机制的一个回顾。现在这本《超常增长——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是想从政府和市场经济这个层面，探讨中国经济是如何驾驭资本实现超常增长的。

中国经济是如何实现超常增长的？从根本上说，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明确方针。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更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

但是，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可能还会更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人福山一度把自由民主看作“历史的终结”，有些沉迷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借着这股“西风”，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这个“宏观调控下”，说它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畸形格局，质疑这是给“市场”设置了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争论究竟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还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就严词批判“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总是担心会“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多次强调只能是“有限政府”。

作者研究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轨迹，发现有五个突出因素：

第一个突出因素是中国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主要是在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如过去的“两弹一星”这类重大项目，无论是建设、投资、技术引进、运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话语权，都要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

中。惟其如此,中国才创造出高速铁路、超级计算机、神舟飞船空间技术、军工、核电、新一代通信标准等战略产业的辉煌奇迹。中国修建了世界上最大最好的高速铁路网、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修建地铁,上海已经修建了688公里的地铁,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地铁线。最新的喜讯是C919大飞机在上海成功首飞。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把我们的高速铁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和超级计算机一起,并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这个评价,高屋建瓴,令人振奋。

第二个突出因素是,我们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国有企业进行的脱胎换骨的改革。没有听从那些休克疗法的误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对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的主体,并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最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当然也是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第三个突出因素是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联合和并购,通过抓大放小,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正如邵宁所说,主要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由此推动了国退民进,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放掉的一大群中小企业恰恰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机会。现在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50%,民营经济的就业占全国的75%,成了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

第四个突出因素,是在城市化方面,城市政府突破了西方国家政府“只能管理、不应参与经济”的框框,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那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来兴起的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而是别出蹊径,通过成功地掌控中国特色的城市资本,即利用政府所控制的“土地”加上“三通一平”(指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七通一平”(指“三通一平”再加通邮、通讯、通暖气、通天然气或煤气)以及基础设施的资本,我通称为城市资本,在招商引资上引导外来资本的竞争,驾驭外来资本,发展了城市经济。由此,我发现正是城市政府的驾驭资本,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第五个突出因素,是资本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能鼓励金融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的机制。

什么是“资本化”?资本化的真正奥秘就在于,如何把企业具有创造未来收入能力的资产“开发”成为资本市场上可以交换的资本。中国长期以来资本极度短缺,1990年证券市场开放,正好有了一个“资本化”的机制,给企业和市场提供了一个在银行之外直接融资的机会,通过股市融资、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私募和金融创新,成为分流银行资金的重要渠道。到2010年末,20年来累计为2000多家上市公司实现股本融资2.5万亿元,债券融资2.9万亿元;募集投资基金2.51万亿元,合共近8万亿元。到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开放25周年,沪深两地已有上市公司2827家,总市值53.13万亿元。2016年度A股市值收于50.62万亿元,沪深两市市值整体小幅缩水。人们习惯于把企业上市融资说成“圈钱”。证券市场并不是“点石成金”,但由此具有了一个从市场上开发资本并能以较高的收益作为回报的机制,为经济的超常增长增添了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说,中国在列强环伺下,成功地运用强势政府,通过股份制改造,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改革和发展了具有强控制力的国有经济,从无到有地扶植非公有制经济,成功地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外来资本发展城市经济,从容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正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市场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且,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有30年对讳言资本的抑制,改革开放后重新认识了资本,这才有了这三十多年政府、企业一齐忙于引进资本和扩张资本的驾驭资本的活动,推动了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至于强势政府有什么负面影响?我以为,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60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和2.7亿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没有公平地对待8亿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还有追求经济业绩,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助长了污染,乃至区域分割,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同时,必须强调指出,政府的强势并非一成不变。政府在强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之后,要懂得退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的说法,就是“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中国的

强势政府是从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演变过来的,它在干预经济方面,往往存在着一种过度干预,即所谓错位和越位,或不懂得退场的毛病,这是中国的强势政府与生俱来的某种惰性,或者说是固有弱点。因此,我们在正视强势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惰性或固有弱点。我以为,正如西方在政府干预上往往有画地为牢过分犹豫的惰性一样,中国则往往有政府当家惯了、干预过多和不愿退场的惰性。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都必须克服各自的惰性。

还要看到,最近这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有一个新的特点,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速铁路加城市群,充分发挥了级差收益原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作用。以长三角的无锡市来说,2011年无锡的人口是467万人,2015年达到651万人,4年增加了将近一半的人口,这都是得益于高速铁路推动了长三角大城市、特大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了无锡市的地域扩大和经济繁荣,因而才带来了人口的增加。但是,在经济学界,很多谈论经济增长的文章却很少谈到高速铁路加城市群和级差收益原理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几乎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一个盲点。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方面,给有志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荣卫红女士不辞辛苦,特别是对本书书名反复商讨,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还要感谢郑捷同志为本书穿针引线,侄女邵鸣为本书出版奔波,在此一并致谢!

是为序。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引 言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驾驭资本

- 一、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 002
- 二、习近平推进“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 / 006
- 三、重新认识资本与拨乱反正 / 008
- 四、驾驭资本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 / 017
- 五、小康时期在宏观上的驾驭资本必须告别“穷管” / 018
- 六、中国的强势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 021
- 七、强势政府站上了“历史的终结”的位置 / 026
- 八、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一个驾驭资本的问题 / 027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了中国崛起

- 一、计划经济时期驾驭资本的成功与失误 / 035
- 二、国有企业体制的缺陷 / 038
- 三、“包干”和“拨改贷”的改革及其副作用 / 040

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 / 043

五、国有经济管控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力推股份制改造与
公司上市 / 047

六、执行两个“毫不动摇”上的偏颇 / 051

七、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 052

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制度自信 / 059

第二章

民间资本峰起壮大了非公有经济

一、“从无到有”:多方面扶植民间资本 / 062

二、正名立法,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 / 069

三、早期民营经济发展的三个模式 / 073

四、民营经济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 082

五、民营企业发展的几个案例 / 089

六、民营企业不必急于走出家族制 / 095

第三章

城市政府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城市经济

一、现代化城市经济的特点 / 101

二、“时空压缩”和城市化时空关系的实践 / 107

三、城市政府驾驭资本“以城引市” / 110

四、城市政府成为从事“经营空间”的准经济组织 / 116

五、城市经济发展的三个典型案例 / 123

六、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 131

第四章 从高速铁路谈到技术引进要保持主动权

- 一、中国高铁崛起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 / 135
- 二、高速铁路“时空压缩”下的五个超级城市群 / 138
- 三、高速铁路加城市群的“时空压缩”使城市经济的发展
如虎添翼 / 144
- 四、站在“互联网+”风口上的城市经济 / 152
- 五、“高铁危言”噪音引起的议论和思考 / 161
- 六、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引进需要有国家的直接掌控和驾驭 / 165

第五章 金融改革:在市场经济中驾驭金融资本

- 一、1979—1993 年:建设以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 / 174
- 二、1993—2003 年:把专业银行改造成国有商业银行 / 187
- 三、2003—2010 年: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 / 190
- 四、“银行贱卖”与“投行思维”的愚蠢 / 195
- 五、金融改革:告别“仇富”的金融管制,向民间金融开放 / 199

第六章 资本运营:投资银行争夺货币和驾驭资本

- 一、券商的金融创新,鼓励资本市场同银行分流资金 / 206
- 二、债券市场孕育着券商创新的商机 / 210
- 三、资产证券化是“资本化”和金融创新的又一大商机 / 211
- 四、以价值发现和优化资源配置为己任,建设一流投资银行 / 216
- 五、资本运营方式举例 / 217

六、投资银行如何从“价值发现”上创造财富? / 228

七、创建中金公司:中国建设一流投资银行的成功案例 / 232

第七章

农民工市民化和新的农村建设

一、大规模农村人口的迁徙:改变二元经济的唯一的出路 / 241

二、农民工市民化:首先把农民工从附着于家庭承包的土地上
解放出来 / 242

三、城市要告别旧的征地套路,重点是盘活存量 / 247

四、农民工市民化:特大城市能不能走在前面? / 250

五、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257

六、最新的重磅消息:农地“三权分置” / 262

七、简短的结束语 / 264

引言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和驾驭资本

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用六十多年时间,走了西方大国工业化二百多年的历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466 亿元,1978 年提高到 3650.2 亿元,29 年增长 6.83 倍。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停滞不前。从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水平看,1952 年中国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的比例为 5.2%,1978 年反而下降为 5.0%;1948 年,中国人均 GDP 在世界各国排第 40 位,到了 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却是排倒数第 2 位;人均 GDP 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 224.9 美元,仅是印度人均 GDP 的 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 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 63.3 元,农村人均口粮比 1957 年减少 4 斤;1977 年全国有 1.4 亿人平均口粮在 300 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各项灵活的政策为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9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 2.72 万亿元,比之 1978 年的 3650.2 亿元,14 年增长 6.45 倍。

中国经济真正的超常增长,是从 1992 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的。2016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74.41 万亿元,比之 1992 年的 2.72 万亿元,24 年增长 26.36 倍。2010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统计局每年实际增长率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9.62%,同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年均增长 3%—5% 相比,中国约有 4%—5% 的超常增长。假如在过去 24 年中,中国像一般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常规市场的均衡经济增长路径,那就会失去每年至少 4% 的超额增长,2016 年中国的 GDP 总量就不会是 74.41 万亿人民币,而会是不到当年 GDP 总量的一半,即在 37 万亿左右。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关键更在于挑战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超常增长的起源,还是要从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启动了驾驭资本的钥匙说起。

一、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最初只有一个先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后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真正的实践,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难题,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熏陶下难以自拔,不但讳言资本,而且长期不敢言富。扭转乾坤的,是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了驾驭资本的钥匙。

新中国成立是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民族解放战争阶段,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只不过领导它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共产党;革命的目标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曾经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即使在1953年的《毛泽东选集》中编入此文时修改为“必要的发展”,那也总是要允许发展的。这一正确、伟大而又英明的论断,曾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开明资本家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直到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仍然是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应该说,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作的谨慎和城市政策的正确,才赢得了1953—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但是,毛主席的阶级政策,一向是“亲贫远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改,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均贫富;城市职工低工资,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谁也不敢讲劳动致富。1952年,刘少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这已经是初露“仇富”的端倪;1953年农业合作化时,仍然是提“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问题是

1954年,毛主席“按照新的情况”重新作了阶级分析,说是要“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①,由此改提“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口号,并且固执地把不同意这一主张的邓子恢批判为右倾,迫使邓子恢作了检讨。这就不仅仅是“亲贫远富”,而且是不允许有新的“劳动致富”了。所以十年后的四清运动是提“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是“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城市工商业,最初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号召下的“多种所有制共存”,1956年变为敲锣打鼓“全面公私合营”,提倡给资本家分红;“文革”时却鼓吹取消定息,反对剥削,史无前例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

“文革”后期,更是从“亲贫远富”发展到公开“仇富”,人们高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主席时刻担心市场经济的小生产自发势力会使中国沾染上修正主义。他常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乃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法权,废除八级工资制;认为“我国现在实行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等等”都“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时刻担心“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而“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不但带来了贫穷,而且使中国的短缺经济更加短缺,商品供应极其匮乏。到了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煤、油、糖、布、肉、蛋、卷烟,春节的花生、瓜子,直至青年人结婚的床、柜、桌、椅、暖瓶和“三五牌”闹钟,无不凭证供应。我们能够用以自我宽慰和解嘲的,却是斯大林的一个权威性的说法,认为生产的增长落后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对长时期的贫穷和消费不足虽手足无措,却安于靠发票证和排队来抑制消费。从根本上说,共产党在革命时的口号一直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并没有昭示革命胜利后要让无产者也能成为有产者;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一直实行“仇富”的金融管制,认定一切金融活动都同孳生资本有关,一切金融活动只能由国家垄断,不能让民间染指。

1949—1978年这29年,即通称为计划经济的30年,尽管也有不少挫折,但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是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毕竟增强了国力,是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功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为后世子孙作出巨大的贡献。

十年“文革”,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城乡劳动者一贫如洗。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有6万多人经宝安县偷渡逃入香港,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那时逃港的民众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1977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汇报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面对上述平均主义旧体制旧理论的枷锁和“厌资”“仇富”思想的束缚,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登高一呼,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大声疾呼,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确实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就是后来邓公反复阐释的“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大理论。正是这个允许“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改革开放中一切致力于勤劳致富的劳动者启动了重新认识资本的钥匙,使我们走出了贫穷、短缺和匮乏。而邓公后来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是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活的现实终于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过30年的计划经济,我们并没有“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处于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过的那个应当容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没有沿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提法,而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中用了一个新的提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新提法，为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留出了广阔的空间。

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接着，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更是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观点。这些都是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具体化，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这些构想，影响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人的生活总是需要比较。十年“文革”把劳动者逼得一贫如洗，而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让广大劳动者敢于打破一切平均主义和“厌资”“仇富”旧体制旧理论的思想禁锢，由此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与劳动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允许人们“先富起来”，就得允许人们积累资本、驾驭资本，允许人们用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和驾驭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因为启动了千家万户城乡劳动者重新认识资本的钥匙，这才有了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是让农村的土地从集体资本的捆绑中又还原为个人和家庭的自由资本。而1979年知青返城大潮催生了中国城市初始的个体私营经济，让城市居民在走投无路中认识到这些修车、修鞋、补锅、照相、缝衣、开小吃摊铺……正是养家活口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本。固然，这一工一农都是恢复了“小生产”。确实，正如毛主席时刻担心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一贫如洗的千家万户的城乡劳动者，如果没有原始资本，没有这个初始的“小生产”，就不可能解决温饱，更不可能像中产阶级一样富裕起来，又何从谈论社会主义？！何从谈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上去！

后面，接踵而来的，是80年代允许技术入股；90年代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这是承认技术和管理都是资本。1990年股市开张，劳动者可以购买股票成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有产者”；而1998年改革“福利分房”，实现“居者有其屋”，劳动者更是第一次成为拥有不动产的有产者。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

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明确把“资本”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且明确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7年中共十七大更明确宣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劳动者告别“无产者”，步入资本的殿堂，一步步地迈入了“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的社会。

二、习近平推进“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以后不久，2012年12月24日，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何谓中国梦？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着，习近平把实现“中国梦”同“两个一百年”联系起来。

习近平同志说，“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这里说得很清楚，中国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是在2049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毫无疑问，习近平的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这个梦想，凝聚和寄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屈辱的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

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在2013年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共十八大精神上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